

导 言

宋代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把宋代史学和整个中国史学联系起来思考。陈寅恪先生说过：“中国史学莫盛于宋。”〔1〕又说：“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2〕应该说这是从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作出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在宋代之前有汉唐史学，特别是马班为代表的西汉史学开创出中国古代史学的规模与气象 在宋代之后 有明清史学 特别是有清一代史学不但有以考证见长的乾嘉史学，而且还有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和经世史学 其时的疑古史学也都留下灿烂的篇章 因此 理解宋代史学之繁盛 应当从整个文化史的角度深入思考，“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当然我们可以展示两宋的史学繁荣的事实 纪传体史书如新旧《唐书》、《东都事略》等外 还出现了继司马迁之后、今天能看到的又一部纪传体大通史《通志》 编年体史书在隋唐经历一个衰退的历程后 到了宋代得到空前的发展，《资治通鉴》这样的史学巨著出现了 并产

〔1〕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40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2〕 同上 第 245 页。

生相当大的连锁反应 继起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著作 典制体史书《文献通考》是《通典》以后的又一部大书 考史一类史书相当发达 金石学形成专门学问;《资治通鉴纲目》创造出新的史书体裁——纲目体 与纪传、编年并立 鼎足而三。《三朝北盟会编》作为当代史著是特别要提到的。地方志、笔记数量多,史料价值相当高。两宋史苑内,绿杨红杏尽争春,美景不胜收,这是明摆的事实,是以前的朝代难得一觅的景观。这里就不再罗列了。

仅此 要从总体上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还很难说服人。两宋史学发达要从更深层面上思考,作出解喻。

第一节 宋代史学思想的新精神

两宋史学对历史作理论性的思考,和古代经学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能产生在理学发展的过程中。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称宋代是经学的变古时代“,变古”两字 贴切地说明了宋代学术与前代学术的不同之处,它体现出中国学术在宋代发生一次大的更新 史学同样不是一般更新 而是一次大更新。

宋代史学思想的明显的时代印记是理性思维的发达。宋代理学的勃起,是中华民族思维继魏晋玄学之后又一次升华。贯通天人的理性思维对史学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宋代史学思想同样体现出“变古”的特点。大多数史学家具有多重身份,他们既是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 很多人在政治舞台上是非常活跃的风云人物,同时又是一代大思想家、理学家。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吕祖谦、李焘、李心传、朱熹、马端临、王应麟等,

不只是以史学名世 写出传世的史著 而且在理学史上都是有影响的大师 在《宋元学案》里 他们都有重要的地位。宋代史家群体这样的一身多任特点，造就出独有的史学风貌。他们的史著一般都没有局限在记时叙事的要求上 而是展开了对宇宙、对社会人事、对历史盛衰变化、对社会出路的更深的思考 以探求天人之理。

又一方面是思想家在架构理学体系时，把中国历史放在他们的视野中。他们说“经精史粗”、“经先史后”、“经本史末”，但并不是抛弃史学 理学作为完整体系 不能不要历史的说明。理学体系形成，对旧经学的破坏与发明经旨，离不开史学这个阵地。天理体现在万事万物中、体现在社会人事中，万物一理 理一分殊 社会人事历史是宇宙变动的一部分 又都是受天理的支配。“天”与“人”联在一起 在有的思想家那里，“人”融化在“天”之中。宇宙万事万物与人类历史联系成一个整体，思想家从理的角度阐明包括历史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变动。可以说，宋代理学家的历史观是古代的大历史观，宋儒把史学思想提升到哲理的高度上。

宋代史学家论历史盛衰 希望再造一统盛世的理念 是宋代史学思想的又一引人注目的内容。宋代君王重经亦重史，读经读史、讲经讲史成为风气。宋太祖在军中不惜千金求购经史书籍 太宗诏史馆修《太平总类》 曾要史臣日进三卷 以便亲览。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等 都是关心修史大事的帝王 为的是求治道。张载说自己治学就是要“为天地立志 为生民立道 为往

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1〕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希望宋神宗能跻尧舜之治，体现出当时史家的普遍心声。

包括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体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亲和力。辽、金、西夏、蒙古的统治者倾慕中原文化 重视搜集和阅读有关的史籍，以求找到可资借鉴的统治方略；仿效宋朝设立史馆机构 编修《实录》。《史记》、《汉书》以及《唐书》、《贞观政要》等是最受欢迎的书籍。辽圣宗的盛世、金世宗大定之治 都和他们对历史的重视有密切的关系。金世宗很担心子孙忘记自己祖先，但他和他的后人热心宣扬汉文化 大力提倡读《唐书》和《贞观政要》 从这些史书中吸收智慧 收到相当大的成效。金世宗也因此被称作是小尧舜。少数民族的明君在运用历史知识上，相当成功 史学史上应该浓墨重彩写上一笔。当然 这些地区由于理学没有大的建树，史学思想还停留在古今类比的层面上。

严夷夏之分、辨正统 体现出的是统一的要求。少数民族如契丹的辽 宣称自己是炎黄的子孙 从而体现出一种民族族源的认同意识。金人占领地区的汉人也吸收少数民族文化“民亦久习胡俗 态度嗜好 与之俱化”。〔2〕这一时代的民族思想、政治变革观念融会在盛衰论中。宋代《春秋》学中的尊王大一统思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得到长足的发育 为历史兴衰观念铺垫 成为其理论的形态。

与上面有联系的是宋代史学家关心社稷命运 体恤民瘼 提倡史学经世。学术有分野 有理学、气学、心学之别 理学有濂、

〔1〕 《张子语录·语录中》见《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

〔2〕 范成大：《揽轡录》见《说郛》卷六十五 宛委山堂本。

洛、关、闽的差异。他们在求理的过程中，很多人历经劫难，遭遇坎坷，却没有磨灭追求天理的信念，没有丧失对历史前途的信心。即使是被贬官、编管，但讲学不曾中辍。陈亮的事功之学、叶适经制之学，都带有强烈的现实感、时代感。即使在南宋后期，朝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史学家、理学家也念念不忘中兴。在朝廷多事之秋，史学家、思想家都努力使学术经世，作有用之文，以天下为己任治史、治学，既不是为仕途升迁，也不是为增殖田产，而只是为追求自己的信念。宋儒的经世观念是中国史学思想史的优良传统。

当代史的撰述形成了风尚。除了各朝实录、国史的编写受到朝廷高度重视外，司马光、王偁、苏颂、李焘、李心传、徐梦莘、洪迈、王应麟等，在当朝史撰写上都是有成就的史学家。方志与地域史的发达，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史家对现实研究的重视。两宋史家重视写典制体史书，和理学上的经制之学相通，是作为经世之用。两宋的地区史学如浙东史学、蜀中史学、江西史学、闽中史学和新安史学各有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不忘恢复，编修史乘。应该说，完整意义的经世史学是在南宋形成的。

宋代文化萌发出人文思潮，在史学领域内也看出这类情结，这是研究史学思想史要注意的课题。笔记史料记录社会经济活动以及科技知识，同时反映出都市生活的场景，写出市井细民的心态，成为史部书的新的方面军。代表性的作品有沈括的《梦溪笔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洪迈《容斋五笔》、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

在都市中的瓦子勾栏中，讲史是说唱曲艺的重要内容，分

唱、说两大类“，说”即说书，有讲史、讲经、小说与说浑话四种。讲史是“讲说前代史书文传兴废争战之事”，〔1〕传播历史知识，宣传历史观念。如果说有俗文学之类，那么也可说有俗史学，这是都市文化兴起的一大特色。它突破了传统史学形式，是人文精神萌发中的现象。下层百姓、市民通过讲史说书，宣传忠义节气观念，表达出对国家社稷前途的担忧，对腐败的愤恨，对违背人性道德的抨击，其中也夹杂纲常伦理的说教。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讲史话本出现，通俗史学作品繁荣，透露出时代文化的一缕新气息。

两宋 320 年的学术，一变于仁宗庆历之际，再变于南宋孝宗乾、淳时期。高、孝、光、宁所谓的“中兴四朝”结束，南宋学术进入到后期。宋、辽、金的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形成两个大的时段，北宋九朝是一个大时段，其间宋仁宗庆历年间是个分界线，此前是宋代史学思想史的第一个阶段，这以后的史学思想是第二个阶段。史学思想发生变化，根源于社会政治变动，也是理学勃起所造成的局面。辽代史学思想留下它的踪迹。

“靖康之难”，宋室南渡，整个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动。宋孝宗与金世宗时期，中国南北创造出相互辉映的史学文化。“隆兴和议”后，宋金并立，在几十年的相对平静的环境中，由于“乾淳诸老”的创造，出现了学术繁荣的局面。朱学、陆学、吕学鼎足而三，湖湘之学是有影响的学术一大宗。经制之学、事功之学展示出史学的活力。史学思想也是大发展的时期，南宋史学思想变化，以理宗为界划分前后两个时期。高、孝、光、宁四朝是宋代史

〔1〕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学思想史的第三个阶段。金代史学思想相当活跃，借鉴史学观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从理宗到南宋灭亡，是第四阶段。理宗时期 朱学地位上升 南宋统治走下坡路，一蹶不振；理学逐渐形成教条，失却了原先的创造性活力。朱陆门人相互出入，无论朱学还是陆学都没有融铸为新思想，形成新的学理 以使学术再一次升华。朱学与陆学混杂 朱学流于训诂 陆学流于禅。这些都影响到当时的史学变化。理宗到南宋灭亡，是宋代史学思想史的第四个阶段。史学在保存文献以及文献训诂考证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 发明春秋史法、史例 进而改写史书 史学在枝节上有一些进展 但在史学思想上没有增添新的内容 反倒是逐步走向虚脱。在当时条件下 民族的节义观表现很突出，宋代末年的黄震和元代前期的大宋遗民中的史家如胡三省、马端临 他们在史著中留下了自己的心迹。

宋代史学思想史经历了一波三折，留下值得深思的问题。

——理学与史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理学浸润到史学领域中去 是明显的事实 那么 宋代史学是不是理学化了？史学是不是消极被动接受理学的影响，而对理学的发展没有影响？

——史学对宋代社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宋代君臣相当重视史学，十分虔诚地对待修史大事 历朝实录、国史的编修成为继位之君最关心的大事，只有宰臣才有资格监修国史。值得玩味的是 宋代帝王深明“鉴前世盛衰、考当今得失”的道理 却没有使宋代避免覆灭的命运。“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北宋最后的两个皇帝徽、钦二宗当了金人的俘虏，“靖康耻”在宋人的心灵上烙下深深的印记。南宋最后的小皇帝被大臣背负着投海而

死。那么，史学的社会作用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司马光希望赵宋王朝能跻尧舜之治，留下了他和他的助手共同编修的巨著 294 卷《资治通鉴》。但司马光在书中写的‘臣光曰’盛衰论 不说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是不着实际的迂论。赵宋王朝没有从中找到救世的良方，更遑论什么尧舜之治了。今天人们读这部书是不是细想过这个问题？该怎样说清这中间的道理。由此，人们会想到另一个问题 历史学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借鉴的功能？这是史学思想的重大问题，中外史学家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本卷在有关章节中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第二节 宋代社会、学术与史学思想

公元 960 年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 建立了北宋 到 1279 年南宋灭亡 宋朝存在了约 320 年。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应当把宋、辽、西夏、金联系起来 加上后来的元朝 也就是把 10 世纪到 14 世纪的中国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按白寿彝的先生的意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组合时期。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 这一时期 中国文化大步走向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文化显示出自己的魅力。今天所说的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儒学 主要是指经过更新了的宋代理学。宋代理学、史学、文化、艺术以及宋代科技文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宋人的贡献）对世界史、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史学在内的宋代文化在走向世界过程中，在蒙古西进过程中，和域外文化发生碰撞，加速了中外文化的相互吸收。

契丹族、汉族、党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 共同创造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是世界文明的宝库 史学文化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两宋史学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历史学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作出了记录，也从开阔的角度反映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大变动。它既是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记录 也是中外交往的记录。《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文献通考》以及各种笔记史料等等 不仅反映了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创造与交往，而且也反映出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史书有关部分以及诸如《旧唐书》的《突厥传》、《回纥传》、《吐蕃传》、《南蛮西南蛮传》、《西戎传》、《东夷传》、《北狄传》 以及《文献通考》的《四裔考》等等 这些记载作为有联系的整体，写出了历史大变化。吕祖谦等史家把中国历史盛衰和周边民族历史盛衰联系起来，分析历史变化的原因。这些是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开阔的历史意识、世界史意识。

另外 史学家重视对历史的借鉴 历史的借鉴的意义得到充分的发挥 特别是在辽、金历史发展过程中 借鉴历史是一代君王开明政治的内涵。历史学对宋代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影响，思想家、政治家进行改革 少不了要借鉴历史 要利用历史思想资料。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所发的议论 实际是对庆历新政的主张作了历史的说明。但历史学功能是多层次的，发挥的效应也是多样的。王安石并非不重视史 但他以《周官》行变法 历史观不正确，这对他的变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可以概括为“资鉴”二字 但为什么却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这里要多说几句。发挥史学借鉴的作用，关键的一个问题，

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是以历史去验证纲常的永恒性，还是把历史放在一定条件下，从中思考得失成败，进而汲取智慧？司马光在总结历史中，阐述重人事的史学思想、反对迷信以及对历史帝王的分析等，都有可取之处。但重要一条是他脱离条件总结历史。王夫之批评司马光，说：“夫古今异时，强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趣，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温公以之矣。”〔1〕这可说抓住了要害。其次，他不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新鲜的经验，而是用历史去验证先验的认识。翻开《资治通鉴》，开篇便是论说维持等级名分的礼教是历史的盛衰根本所在，这只能是“老调重弹”。他梦寐以求的社会是三代，三代是怎样的模式？结合他在死前任 8 个月宰相时的所作所为，便可以体察他的历史总结，对解决北宋社会问题，是软弱无力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历史学的借鉴功能不是无限的，一个朝代衰败大势形成后，再高谈借鉴历史，很难挽狂澜于既倒。因此，历史借鉴的意义是很大的，但发挥史学的借鉴功能，又是有条件的。只有用变通观点总结历史的盛衰，才能使史学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是史学思想史留下的启示。

宋代史学思想从正面、负面两个方面，都表明历史学的借鉴功能有重大的价值，以特殊的孤立的事实，否定历史学的借鉴的功能，并没有根据。

宋代史学出现新景，展示出新貌和变化，首先还是得从社会变化上作出说明。宋代社会经济出现新的因素，主客户关系建立，反映出地主与农民关系上身份性的变化。两宋的都市商品

〔1〕《读通鉴论》卷二十六《文宗》。

经济活跃 这种商品经济是前资本主义的性质 但由此产生的都市文化 是市井细民人文精神的萌发 当然 也要看到 建立在这样基础上并且又和皇室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的都市文化，带有寄生性。都市文化随着都城和皇室迁移而发生变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和地区经济特点形成 也导致文化中心转移 产生区域文化及带有区域特征的史学。

宋代皇权专制主义高度集中 各种史书都指出这一点 但同时还要看到这种皇权主义统治带有脆弱性。兵权集于皇帝的另一面 却是指挥效率低下。北宋实行右文政策以及所谓‘不杀士大夫’的政策 营造出一种氛围 有利于学术开展争论 但学术争论与政坛上的斗争纠缠在一起，优柔的宋代帝王在决策上常常是首鼠两端 造成政坛风波迭起 绵延不断 无形中又削弱了统治。台谏制度在一定条件下使宰臣成为制衡君权的力量，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发展 社会危机加深 诸多因素促成了文化上的“丕变”。错综复杂的政治集团斗争与党争联结在一起，影响文化走向 史学也陷入到漩涡中。在元祐党争、庆元党禁中 史学家脱不了干系。实录、国史不断编修、重修 背后有深刻的政治与学术文化背景。神宗实录案绵延了几朝，是一个典型例子。

社会现实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通过两条重要途径，一条是现实的矛盾激发史家修史 构成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 形成一个时代史学思想的特质。这一方面情形是复杂的，即使同样的命题，由于时代不同 又有不同的特点。同样讲历史盛衰 两宋以前的和两宋的历史盛衰论有着不同的内容、特征。另一条是一个时代学术思潮，特别是哲学思潮对史学思想的影响。史学思想中的历史观点本身就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哲学的基本观点及

思维方式，影响到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对历史所作的解喻，进而影响到史书的编纂，也作用于人们对史学社会价值的认识。哲学对史学的影响，归根结底也是社会现实对史学作用的反映，但其间又有区别。因此，毫不奇怪，有的历史时代充满着矛盾，社会动荡不定，经济也有发展，但由于哲学的贫困，导致史学思想的苍白，史学缺乏创造性的活力。因此，研究史学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从时代的哲学思潮上把握这个时代的史学，讨论这个时代的史学思想。

这里不是说史学思想只有消极地反映社会现实，被动地接受哲学的影响。史学思想同样对社会现实有重要的反作用。历史著作的刊刻、流传，传播了一定的思想，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危机和出路的思考，对历史前途的认识，对社会各种关系的处理等等。在封建社会里，君王和臣僚总是按照对历史的一定理解，处理军国事宜。两宋崇尚文治，人君观史、读经形成风气，而一些史家也努力通过自己的历史著作宣传一种观点，以“格君心之非”。有的史家明确地宣称自己写史书，是给皇帝提供读本，是为“圣览”。因而宋代社会的治理与变化，其中就有史学思想对现实的反作用。同样，史学思想对理学的变化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二程奠定理学的根基，而不能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讨论历史盛衰之理感兴趣，但对史学的价值还没有充分理解，史学上没有大的建树，影响到二程理学体系的构建。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不但因为他集理学诸家之说，铸成朱学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因为他努力把包括史学在内的各个学术部分纳入到理学天地中。

一、宋代理学与史学

从史学思想角度来审视 宋代史学思想每一步进展 都不同程度受到理学的影响。宋初邢昺、孙奭对经学的整理 是文化史上的盛举 但沿着旧经学的路数 整理经籍而难有发明。及至三先生胡瑗 安定先生 孙复 泰山先生 和石介 徂徕先生 出 儒学始变 欧阳修作为濂洛先驱 其庐陵史学出现以“理”说历史盛衰之端倪。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邵雍创新儒学，理学勃起。以史证易之学风起 以史说理、说道者 成为一时风趋。范祖禹、罗泌、苏辙等史学作品 理学道学痕迹尤深。司马光写史未尽合理学之尺度，为程颐所不满，被斥之为学术不纯。

南宋理学是陆学、吕学、朱学三大流派。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 朱氏将史学归入理学体系中 吕东莱的史学“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重文献之传 吕氏调和朱陆 其学术显现出斑驳的色彩 朱学又杂有心学。陈傅良、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学中 史学为重镇。浙东经世史学开一代风气 及至朱学传人的黄榦、北山四先生 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 和饶鲁 双峰 理学、史学，波及元明史学。

两宋理学对史学的影响，可以归纳为这几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对历史认识的发展上。理学家说自然界和社会的变化运动都是天理流行，是阴阳消长的气化运行，二程说：“往来屈伸只是理也 盛则便有衰 昼则便有夜 往则便有来。”“时所以有古今风气人物之异者，何也？气有淳漓，自然之理。

有盛便有衰……气亦盛衰故也。”〔1〕万物一理 理一分殊 社会的人事变迁有具体情形 表现出盛衰交替循环。朱熹说：“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 只管恁地循环去 无有衰而不盛者。”〔2〕天理支配自然与社会的盛衰运行。

理学家讨论天人问题 以‘理’作为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社会的最高概括，把人类社会历史作为宇宙总过程的组成部分。求“理”的思维特征之一 是通天通地 贯通古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从根本上说 是‘究天人合一之原’。〔3〕张载用气说明人与自然事物是统一的 世界万事万物和人都是‘气’的体现 气有清浊昏明 造成人与物的区分。《西铭》说‘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这种气化史观是打通天人的理论。邵雍写的《皇极经世书》把自然发展和社会历史作为统一的行程 编排出‘开物’到‘闭物’的运动周期。二程、朱熹的‘理气说’把社会史和自然史统一起来。

宋代史学“通识”发展的一个原因是宋代理学的影响。贯通天人思考历史，在宋代古史著作中得到体现。胡宏的《皇王大纪》、罗泌的《路史》、苏辙的《古史》等著作涉及到宇宙运动生命起源、社会出现和发展 贯通天人的思考以证明天理的先验性和永恒性。此外 如《稽古录》、刘恕《通鉴外纪》以及黄震的《古今纪要》、金履祥的《资治通鉴前编》等等。这些著作编纂的宗旨，

〔1〕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见《二程集》第一册。

〔2〕 《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

〔3〕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九《乾称篇上》。

同《皇王大纪》是一样的，“广摭史传以经义贯通之”。〔1〕

史学“通识”同样表现在对人类最初社会的描述上。上述古史著作以及郑樵的《通志·三皇纪》等从史籍及传说中摘取材料写进史书，反映对初民的产生、初民社会的认识。这些认识建立在传说的资料上，是一种推想、揣测，但毕竟还是古史观念的发展。

宋人对两汉以来的讖纬神学、灾祥说的天人感应理论表示怀疑，提出批评。用“理气说”贯通天人古今，认为理支配历史的变化，以天理运行的情况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依据。在理学家、史学家中，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历史分成先王、后王，或者说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用二程的话说，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以法把持天下。邵雍以皇、帝、王、霸来概括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特点。朱熹说得更明确：三代天理流行，汉唐人欲横流。史学家同样表现出对三代的推崇。司马光是这样，马端临同样有这样的倾向。他一方面指出制度应该因时变化，“返古实难”，这是他思想中积极的方面，但同时他认为唐虞以前是公天下，夏以后为家天下，秦始皇灭六国，是“尺土一民，皆视为己有”。

对历史起作用的是天理，“理”的社会属性是封建纲常名分，这是理学解释历史的基本逻辑。宋代史家多从这样的视角谈历史的兴衰治乱。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篇表明对历史盛衰治乱的看法，维系纲常名分的礼制，才可“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宋代的史评著作、史论文字以及史著中的史臣“论”、“曰”不少以

〔1〕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五《皇王大纪跋》。

是否合乎天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件，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

理学家从理的高度看待历史，不满意谶纬神学一类粗鄙的天人感应说对历史的解释。一般地说 他们没有否定天命 但少言天命；不赞成牵强附会说灾异，认为言灾异须达理。可以说，这也是大多数史家的基本思想。相比较，史家在肯定天理对历史盛衰支配，在对天命论持保留态度的同时，更强调人事作用，用欧阳修的话说：“盛衰之理 虽曰天命 岂非人事哉！”〔1〕

理学作用于史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历史著作编纂产生影响 这种效应体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史法、史例，二是史书编纂体裁。这些又着重体现为宋代《春秋》学对史学的影响。

理学各个流派不同的学风，也影响到史学。从史学思想角度看，两宋史学可以大体分成这几支流派：

一是欧阳修的庐陵史学。欧阳修的史学价值在于开风气，疑古有据 知今论古。其动辄“呜呼”讲褒贬义例 并非欧阳修史学的根本特征。徐无党是他的学生 他把欧阳修史学纳入《春秋》学中去 演绎出一套史例 很多不合欧阳修的本意。

二是司马光的涑水史学。从理学的眼光看 司马光“格物未精”但从史学的要求看 这是涑水史学的特点。涑水史学重考订 论盛衰 重古亦重今 讲求名分礼制 达到“致君尧舜”的目的。涑水史学一变而有二李史学。李焘、李心传承涑水学风 突出发展“重今”的一面。

三是郑樵史学。郑樵直接批评义理之学为“空谷回声”的虚无之学 重史学求通 典章经制 使史学成为实学 反对《春秋》褒

〔1〕 《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传》。

贬笔法与灾异学说。郑樵史学在宋代史学的理学化过程中是一支突起的异军。

四是考亭史学。朱熹的史学可称之为理学化史学的典型。两宋的古史学如苏辙、罗泌、胡宏及朱熹的门人金履祥等，其研究历史，实则发明经旨。虽然各人见解不一样，学风又不同，但都反映出史学的理学化趋向。另外如范祖禹《唐鉴》一类著作，也是这种性质的书籍，直接体现理学精神。考亭史学重在以“史”明天理纲常的永恒性。

五是吕祖谦开启的浙东史学。吕氏有中原文献之传，“言性命必究于史”，重经亦重史，不名一师，讲求畜德致用。这是吕学特征，同样也是浙东史学的基本特点。吕学讲求致用，与龙川、水心见解相通。其重文献掌故又与蜀中史学相通。吕学的“不私一门”的胸襟，能涵纳诸多学派，浙东史学能成为南宋后期的主要学派，其原因亦在此。

六是马端临史学。马端临的家学和自身的学术承续都和朱学有关系。马端临的学术见解有朱学的痕迹，也毫不奇怪。马端临重视从文献、从典制方面对历史作总结，突出的是历史总结的意识。

两宋史学思想的发展，欧阳修、庐陵史学开其先，然后进入到众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局面。考亭史学后，史学思想进入到和会和总结阶段，而这一过程恰恰与理学的发展相平行。

关于理学对史学的影响，有两个问题要再作一些说明。

第一，理学对史学发展有重大影响，而史学思想的发展对理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史学思想是理学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理学求理，“格物致知”，离开“考古今”“多识前言往行”是无